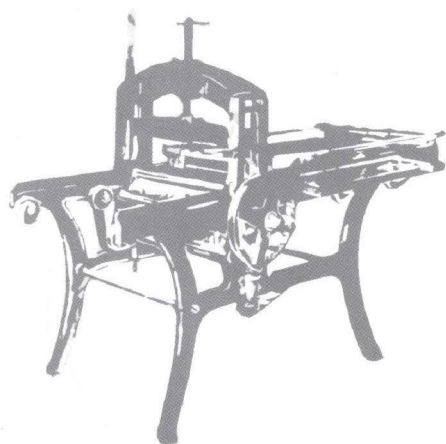


西北农民银行史料

主 编
杨世源



《西北农民银行史料》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张 毅

副主任 秦权记 张绍瑞 魏 云 张保山
郎 煜 杨世源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白子健 刘兆林 师育谦 张尚喜
张如禄 苗秋旺 郝建贵 常福林
慕福明 薛恩廉

主 编 杨世源

副主编 张尚喜 郝建贵 史忠诚 师育谦

总 纂 郝建贵

编辑与校对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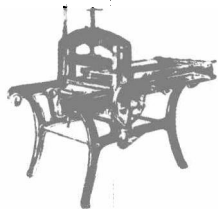
王永生 史忠诚 石平洋 白子健
师育谦 朱维平 苗秋旺 郝建贵
顾 卫 高旭升 郭文亮 黄江英



前 言

晋绥边区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建立起来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要坚持长期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地不能没有自己的银行。这是因为：军队要打仗，就必须解决穿衣吃饭、武器弹药、医卫用品等一系列经费供给问题，而当时的晋绥边区财政十分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也很贫苦，加之国民党、阎锡山政权对共产党、八路军采取“卡脖子”政策，不给提供经费，因此，抗战必需的大量军政费用，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来解决。一方面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军需民食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发行货币，支持财政和贸易，换回有用物资。于是，经党中央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批准，于1940年5月，在原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

西北农民银行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银行，它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它从建立的那天起，就担负起发行货币，占领市场阵地，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土杂币、敌伪币以及法币、白洋等进行货币斗争，支持财政经费和贸易，通过发放贷款贷粮，扶持农工业生产以及实施对金银外币等管理的重要任务。在战火纷飞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西北农民银行的广大干部职工，身肩两副重担：一面与凶残的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一面想方设法开展各项银行业务，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表现了他（她）们的坚强、勇敢、勤劳、智慧以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创造和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因此，系统地整理编撰《西北农民银行史料》，不仅可以为国内外学者、专家探讨和研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史提供翔实可信的资料，且对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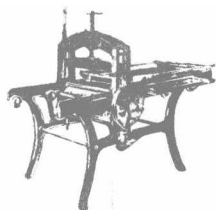


融事业的改革、发展以及对广大金融干部职工，特别是中、青年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都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本书从1983年开始搜集资料，在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先后搜集近二百万字的资料，通过鉴别、精选，编写出这部约七十余万字的史料书。史料的收集范围基本是从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成立起，到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建立止。全书共分为十章，重点章节为货币发行、货币管理、货币斗争、外汇管理、贷款贷粮等。

在搜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师育谦同志和史忠诚同志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张尚喜、张如录、慕福明、常福林同志先后组织、指导、参与了此项工作。全书最后由郝建贵同志总纂而成。此外，薛恩廉、郭温亮、叶耀中、赵□、陈梦奎、田丽蓉、杜晓等同志也参加了部分资料的搜集或整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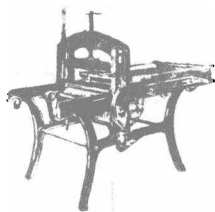
在史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山西省档案馆、山西日报社、兴县关向应图书馆、兴县烈士陵园、兴县党史办和史志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人民银行吕梁分行、兴县支行、临县支行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曾在晋绥边区工作过的老领导牛荫冠、王磊、乔培新、狄景襄、刘卓甫、牛何之、黄伊基、黄达生、傅德胜、高长福等同志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各种原因，西北农民银行的资料保存不够完整，加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遗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坦诚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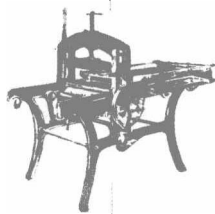
编辑说明

- 一、西北农民银行是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创建后成立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特殊环境下，当时的财经、贸易、金融等均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有关西北农民银行的文件——包括方针、政策、指示、命令、通知、通告等，皆系以行政公署或专员公署名义签发的；又基于较长时间贸易、金融合在一起，故以贸易局（或公司）、银行名义发文极少。
- 二、所谓“外汇管理”在当时是指对区外贸易往来所有的货币（包括黄金、银洋、法币以及伪联币等）的管理。
- 三、为了节省篇幅，有些名词作了适当简化，如“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简称为“晋绥行署”；有些虚语套语一律删去，如“此致敬礼”等等。为尊重原文，原文中的体例未做统一更改。
- 四、为规范化和统一，民国纪年一律改为公元纪年。汉字数据，除必要者保留外，亦改为阿拉伯数字。
- 五、基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资料中的错字、别字、漏字及模糊不清的字句很多，一般都作了校正。改正错别字以[]表示，漏字填补者以（）表示，无法识别者以□表示。
- 六、综观全书，连贯性较差。尤其是西北农民银行建立初期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资料特少，这大概是由于战争环境下，日军频繁“扫荡”，党政军各机关经常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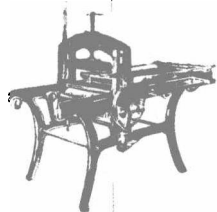
移，好多档案资料散失，没有保存下来所致，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

- 七、本书分类较粗，这是由于不少文稿内容交叉，比如货币管理中，既有对本币的管理，也有对法币、白洋的管理，货币斗争中，既有对法币、白洋的斗争，也有对土杂币、伪联币等的斗争；贷款中，更是农贷、春贷、青（苗）贷、耕牛贷款、纺织贷款等混在一个文件中，不易明确分类，尽管在编辑时作了适当调整和划分，但阅读起来仍有杂乱之感。
- 八、本书上限自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始，下限至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开始发行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为止。但由于到1949年上半年西北农民银行虽已改为人民银行西北区分行，而西农币却仍在市面流通行使，故这一段人民银行西北区分行活动的资料也辑入一些。这似乎与书名相悖，但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 九、少数资料有重复。这是因为有些文件行政公署下发后，各报刊也登载了。为尽量避免重复，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报刊原文登载的，只辑入权威机关的文件，不用报刊的；如报刊登载的内容有发挥、有新意，则一并辑入。
- 十、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均选自山西省档案馆“晋绥革命史料”专卷。



目 录

第一章	组织机构	1
第一节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的背景	3
一	晋绥边区行政区划的发展	3
二	刘少白奉党之命办银行	4
三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政策	6
第二节	基本情况及机构人事变动	9
一	基本情况	9
二	机构及人事变动	13
三	隶属关系及资金管理制度	25
四	干部奖惩、学习制度	27
五	组织纪律	30
六	安全保卫	33
第二章	货币流通与管理	35
第一节	货币发行与流通	37
一	货币政策与原则	37
二	发行制度与手续	41
三	货币投放与回笼	45
四	反假票斗争	55
五	洪涛印刷厂	59
第二节	货币管理	65
一	巩固农钞的措施	65
二	法币的流通与禁用	111
三	对其他货币的管理	116
四	兑换牌价与比价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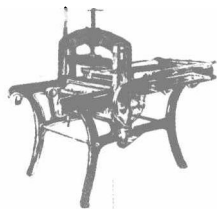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外汇管理	151
第一节	实行外汇管理的目的、任务与意义	153
第二节	对外汇兑办法与外汇管理	161
第四章	货币斗争	181
第一节	与白洋的斗争	183
第二节	与伪钞的斗争	196
第三节	与蒋币的斗争	198
第五章	贷款与存款	203
第一节	贷 款	205
一	农业贷款贷粮	205
二	纺织贷款	256
三	工矿业及其他贷款	263
四	发动互借互济, 解决群众困难	270
五	整理贷粮贷款, 充实信贷资金	275
六	贷款(贷粮)效果	288
七	贷款(贷粮)的经验教训	297
第二节	存 款	325
第六章	财务管理制度	329
第七章	会计出纳与金库	343
第一节	会计出纳	345
第二节	金库	362
第八章	合作社(含推进社)概况	365
第九章	调研与统计	375
第十章	综合性资料	393

封面封底照片说明:

封面照片..... 洪涛印刷厂旧址(兴县杨家坡村全景)

封底照片..... 洪涛印刷厂使用的石印机



第 一 章

组 织 机 构

西 北 农 民 银 行 成 立 的 背 景

基 本 情 况 及 机 构 人 事 变 动

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的背景

一、晋绥边区行政区划的发展

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革命政权，当时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故仍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的名义，公推国民党元老、山西新军领袖续范亭为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新政权仍维持旧的行政区划。辖区（岢岚区）、四（临县区）、八（文交区）、十一（雁北区后改为五分区）等四个专员公署。

2月1日至3日，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会议讨论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行政实施大纲》，内容为六项：（一）实行紧急政治动员；（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三）彻底改善人民生活；（四）实施抗日经济政策；（五）扩大民众抗日运动；（六）普及社会文化教育。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1年8月第二游击区行署改名为晋西北行政公署，晋西北行署成立后，任命了各专署专员。二专署专员张国声，四专署专员苏谦益，八专署专员顾永田（后为康世恩），十一专署专员屈健。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征集编纂指导组办公室编印）

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共辖36个县，第二、三、四、五、六、八等六个专区。二地委书记黄恩铭，专员楼化逢，二专区有神池、朔县、偏关、岢岚、五寨、保德、河曲；三地委书记张雪轩，专员刘墉如，三专区有静乐、阳曲；四地委书记宋应，专员梁膺庸，四专区有临县、临南、离石、方山、离东；五地委书记胡全，专员屈健，五专区有右玉、左南、左云、平鲁、山朔、怀仁、大同；六地委书记秦仲芳，专员马礼智，六专区有静宁、宁武、忻县、崞县；八地委书记饶斌，专员康世恩，八专区有交城、交西、汾阳、文水、清徐、太原、祁北。直属县是兴县、岚县，受委托代管直属县是神府。

（《晋西北行政公署向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1942年10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统一了晋西北和绥蒙地区党的领导；将三、四专署合并为三专，岚县划归三专署，五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五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五、九地委合并为五地委，朔县划归五专署；离东县划归八专署，八专署平原办事处撤销，七、八地委合并为八地委。绥蒙地

区仍设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辖和林、清水河、凉城、归绥、武川、陶林、兴和、集宁、丰镇。

1943年7月，晋西北行署决定以兴县、神府县（代管）、岚县组成了一专署，地委书记吴亮平，专员白刃。1943年11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正式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

1944年9月，晋绥边区行政区划进行了新的调整，撤销一分区，兴县、岚县仍为直辖县，神府为代管县，二分区辖保德、河曲、偏关、五寨、神池、岢岚；三分区辖临县、临南、离石、方山；六分区辖宁武、静宁、忻县、崞县；雁北区（五分区）辖朔县、右玉、右南、平鲁、左云、怀仁、大同、山朔；八分区辖交城、交西、文水、汾阳、太原、静乐、阳曲、离东、清徐、榆太、祁北；绥蒙行署下辖三个分区；绥南分区辖归凉、丰凉、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绥中分区辖归武、萨县、武固、固阳、包头，此时晋绥边区面积约为332570多华里，人口198万多人。

1945年2月8日，晋绥行署政务会议决定，再次成立第一专署，辖兴县、岚县、神府县。专署机关设在兴县，沈越为专员，王一夫为地委书记。1945年9月，吕梁、雁门、绥蒙组织区党委及军区，晋绥行署发布命令，在边区行署下，绥蒙区设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席杨植森；雁门区设行署，主任刘墉如，副主任马林；吕梁区设行署，主任王世英，副主任汤平。1948年5月，中共晋南临汾工委成立，是晋绥分局的派出机关。武新宇任书记，龚子荣任副书记。晋南工委辖晋绥分局第九、十、十一地委和临汾县、襄陵县、临汾市三个直属县、市，共三十一个县市。1949年2月7日至15日，晋绥晋南两行署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政府合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晋绥行署撤销，分别划为晋西北、晋南两行政公署，统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1949年6月2日晋西北行署撤销，成立五寨中心专署，领导晋西北各专署、县。6月3日成立晋南中心地委和中心专署，领导晋南29个县，领导机构设在新绛县城，五寨、晋南中心专署均直接受晋南行署领导。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同时成立。

二、刘少白奉党之命办银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伟大的全民抗日战争的序幕。9月间，日寇占领了晋北重镇大同和东部要隘娘子关之后，大举进犯山西，直逼太原。阎锡山的军队和国民党的中央军都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纷纷夺路南逃。在此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八路军健儿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给日寇以迎头痛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的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当时，兴县到处是八路军，还有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等为抗日救亡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建设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约10月间，那天正下着鹅毛大雪，我从韩家吉村我的家里动身，步行50里路，到了兴县黑峪口看望从太原回乡不久的刘少白老人。我一进门，看见他正在屋里踱步，表情非常严肃。我知道他正在思考问题，于是就未做声，便悄悄地坐在一边。好一会儿，他才发现了我，便坐下来和我谈话。当谈到“动委会”宣传抗

日救亡的情形时，他表示对日本鬼子非常痛恨，他希望我能为抗日救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称赞我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沉思了一下，对我说：“县里要我筹办一个银行，正需要人，你如果愿意，就参加进来吧。”并讲了一些办银行的意义和他的想法。我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是接受了党的任务办银行的，但我深知他一向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很有学问，相信他要办的事，肯定是有益于抗日的。于是，我立刻答应了，少白老人很高兴。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就一同到了兴县城。

这个银行，是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刘少白本人的威望和他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因陋就简，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开始，几乎是一无所有，地点设在县政府前面的一两个套院内，前面是动委会的办公室，银行就设在后院。院墙高大坚固，比较安全。银行只有七八个工作人员，计有：刘少白（经理）、杨怀仁（总务）、刘孝先（保管）、李绍春（出纳）、会计白象玉和牛在华（去延安后改名为牛何之）。我没有分工，主要是给刘少白搞秘书之类的工作。另外，还有县公安局派来的三名警卫战士。

办银行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对此，刘少白费了很大心血，经过多方筹划，并与各方有关要人协商，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动委会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动员全县百余富户献款。而更主要的是刘少白亲自出马，说服动员其故友，也是全县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牛友兰捐助了二万三千元白洋。原先计划集资十余万元，但因为银行急于开张，只筹集了五万元左右。另外，还有一些布匹、粮食也作为股份基金。

大约在11月间，银行召开了首次董事会。到会的有刘少白、牛友兰、刘训三、张干丞、朱哲人等六七位董事，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有关银行开张的一些事项。刘少白德高望重，一致被推举为银行经理。

在确定银行名称的问题上，讨论很热烈。有人提议，为了区别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和阎锡山的“实业银行”，可叫做“兴县银行”；有的人则认为叫“抗日银行”更响亮，更带革命性；刘少白提议叫“兴县农民银行”，他说：“银行的革命性质，不在名称，而在实际效用，但也要考虑到今后业务的开展。根据目前国民经济的情况，农民经济占很大比重，农民应该是银行业务的主要对象。因此，叫‘兴县农民银行’既可以避免反动派的干扰，又使农民感到亲切，看做是自己的银行。这样，银行就必然会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也只有这样，银行才能站稳脚跟，求得发展，才能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全体与会者，十分赞赏刘少白先生的这一见解，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1937年11月底，“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张了。这一天非常热闹，银行院内，披红挂绿，张灯结彩，有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肖克、彭绍辉、刘仰峤等同志和县长张干丞、公安局局长董一飞、“动委会”民运部部长朱哲人等。还有阎锡山的晋绥军驻兴代表、东北军的几位军官以及地方上一些知名人士共二十余人，应邀参加了开张典礼。银行操办了三桌酒席，聚餐庆贺。有这样一件事，对我印象颇深，就是在大家祝贺声中，我们将刘少白亲笔写的“兴县农民银行”的一块大牌子悬挂在大门口。特别是在正屋高大的鲜红油漆柱子上，张贴了刘少白亲自拟写的一副对联“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开荒”。这副对联不仅形式醒目，而且内容新颖，文字活泼，引起大家的兴趣。人们赞不绝口，兴县县长张干丞风趣地说：“刘经理不但是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哩。”

开展银行业务的另一件大事是要出钞票，而当时纸张和印刷条件是非常困

难的。怎么办？刘少白要求大家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一定要尽快地印出自己的钞票来。他说：“要解决八路军当前的经济困难，支援前线，非常重要，刻不容缓，必须分秒必争，尽快把票子印出来。”并说：“没有印票纸就用普通的纸代替，没有铜印用石印，没有人刻印版我们自己刻。”就这样对付着把钞票印出来了。然后，为了解决印票子的纸张和器材问题，刘少白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亲自到西安买回了专门印票子的纸张和铜印版。我在“兴县农民银行”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印了三批纸币。第一批是在1937年11月底，只有2万元，一律是一、二角的小票子；年底印了第二批，计5万元，都是一元一张的；第三批是1938年初，计10万元。还未印完，就因为日寇“扫荡”，银行搬迁，耽搁下来了。印票子先是在县城东关印刷厂，用石印机印刷，银行派人监印，然后加盖银行的钢印生效。为了防止伪造，票面含有三个暗号，对外严加保密，在银行也只有刘少白、刘孝先和我三个人知道。后来银行扩大，才搞了铜印版，印刷厂移至“新民工厂”。

小小的兴县农民银行创办不久，钞票的数量又少，质量又差，但是币值比较稳定，在群众中卓有信誉，人们都很称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的是与刘少白动脑筋、想办法、苦心经营分不开。

刘经理主张钞票面额要小，便于流通。阎锡山发行的“大花脸”（十元）、“二花脸”（五元）钞票，面额大，群众使用不方便。特别是太原失守后，“阎币”、“法币”都不断贬值，威信扫地。而兴县农民银行的币值比较稳定，因此，群众争先前来兑换。这样一来，不仅吸收了外埠资本，而且打开了流通市场。以后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不仅在兴县广为流通，而且在临县、岚县、保德等县，也颇受群众欢迎。

刘少白从多方面注意开源节流，紧缩开支。银行抽出部分资金，发放农业贷款，以刺激和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拨了一部分款项开办纺织厂，办供销合作社。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又加速了资金的流通和周转，从而保证了货币的稳定。

刘少白经常对我们说：“银行的钱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兴县农民银行的十多万元钞票，大部分都支付了八路军，解决了军需急用。一二〇师借款，大多是由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批示，民运部部长刘仰峤亲自来办理手续，每次两三千元，最多的一次提款一万元。有时银行的现金不够用，就开一张便条，加盖银行印章也可以解决问题，以后再由商店持银行的便条前来兑换现金。小小银行，每天兑款、取款、存款的人络绎不绝，显得非常繁忙。

（牛何之：《刘少白奉党之命办银行》）

编者注：牛何之原名牛在华，曾任“兴县农民银行”经理刘少白的秘书，解放后在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工作。

三、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政策

（一）序言

中国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3年了，正因为我们所进行的这一战争，是正义的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能够集中起物力，团结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群众成为一条坚强的铁的战线，从战争中进步起来，壮大起来，保证了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正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垂死的腐朽的阶段，正因他们进行了非正义的掠夺战争，所以在国内涌起了日益澎

湃的广大劳苦人民的反战运动。政治上矛盾的日益尖锐,经济上危机的加剧,兵源上的缺乏,国际上的孤立,已经使他们很困难把这个罪恶的战争支持下去。战略的相持阶段到来了。日寇非但不能如抗战初起时那样快地进占中国的国土,而且军事上的无力,使他们对侵华前途感到无望,可是他们同时也不能放弃这一既定国策。因为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寇改变了他们的灭华策略,而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了。他们企图用分化的阴谋,诱降中国抗战营垒中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败类,如汪精卫之流,破坏抗日战线,以达到其灭华的目的。同时更在其占领的地方进行对游击区的“扫荡”,以便确保其占领地带。从这些地区中,搜刮和利用我们的财富资源,培养战争的力量,企图达到其灭华目的。所以在抗战现阶段中敌人进攻的特点,除了军事上的“扫荡”,后方和政治上的分化诱降外,在经济方面表现的正是这一种以战养战的恶毒阴谋。虽然由于我们在敌后方广大游击战争的发展曾给予了日寇不断的有力打击,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很圆满的成绩。然而部分的效果,他们却已经收到了。我们必须知道:以战养战的阴谋,非但可以补偿敌人的损失,补充他们的力量,同时对我们的经济基础,则是一个很大的危害。日寇方面既可以利用非军用品的运输进入我们的后方,吸收法币以紊乱我们的金融,破坏我们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又可以用经济封锁的方法来扼住我们的咽喉,灭息我们抗战的力量,使我们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困难。为了最终击溃敌人,首先就必须破坏敌人这一最阴险的武器,就必须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进攻,这样才能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完成自给自足的目的,来巩固我们自己的经济基础。只有我们在经济上能粉碎日寇的进攻,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才能完成彻底粉碎敌人经济阴谋的任务,才能在粉碎敌人阴谋的斗争过程中,奠定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经过反顽固、反妥协、反扫荡的残酷斗争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晋西北的新政权是坚持抗日实行民主的,是处在敌人三面包围之中的,因此就必然会遭到日寇的各样破坏与进攻,而经济的进攻与封锁一定会配合军事政治进攻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晋西北由于其地理上优越的条件,无疑是坚持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它的巩固与否,关系着整个抗战的前途,因此,除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外,对敌人经济的斗争,也将是抗日总斗争中一个主要内容。敌人经济阴谋的粉碎,正是说明了我们经济基础的巩固,而经济基础的巩固则是巩固晋西北的先决条件之一。

根据上述总的原则,我们的具体计划,将本着下面这几个方面努力:

1. 发展公营生产,使这些生产成为由政府经营。
2. 推进合作事业运动,使无论生产、运销、消费、信用合作事业,均能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克服过去的一切落后的零碎的现象,以提高生产量。
3. 保护私人经济,不仅不阻碍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帮助其发展,使私人经济服从抗战建国之原则,而日臻巩固与发展。

(二) 经济政策具体的内容

我们的经济政策,在基本上是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完成自给自足的目的,一面粉碎敌人的经济阴谋,一面在这斗争的过程中,奠定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据了这一总的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决定如下:

甲:财政政策

建立金库制度。金库制度和预算决算制一样，也是实行统收流支时必须建立的制度之一。金库制的具体实施是这样的：行署设立一个总金库，各县设立分金库。分金库的负责人要向总金库负责。除了根据支付命令外，绝对不能动用金库存款。这样的制度可以使整个财政能够有计划地、统一地、自如地调动与运用。

乙：金融政策

我们的金融政策，主要是成立地方性银行，发行钞票。

敌人对我们金融的进攻，主要的方式是以推行其伪钞、军用票来换取我们的法币，从而扰乱我们的金融制度和破坏我们的金融基础。同时利用换取的法币夺取外汇，或购置原料，以充实他们的力量。我们为了抵制敌伪这种金融的进攻，就必须成立地方性的银行。地方性的银行，将是粉碎敌伪这种阴谋的有力武器。

西北农民银行之成立，正是为了与敌人作有效的金融斗争，它的具体任务正是“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做斗争”，在被“隔断的区域”发行“地方纸币”。为了巩固省币、法币的信用，为了巩固我们的金融基础，我们以民众自动献交政府的法币 300 万元充当了银行的基金，发行了地方钞票。用法币充当基金不但巩固了法币的信用，而且可使法币不致外流，我们所发行的地方性的钞票，对敌人用处很少，我们的金融制度，便有了独立自主的基础，不会受到敌人经济进攻的影响。同时，相反的，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我们所发行的钞票既有充足的准备金，而发行量又是有限的，所以便可以永远维持信用，永远巩固坚强地奠定了我们金融的有力基础。

除了上述的任务而外，银行已决定积极投资于工业与合作事业中，这对晋西北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其伟大的意义的。

丙：农业政策

农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低利农民贷款。为了解除农民的痛苦，我们除举行了春耕贷款以外，还举办了其他的低利贷款，例如在四区专署便曾提出了 5 万元款项，作为一般贫农的年关贷款，这一关心民间疾苦的政策，已经得到了所有群众的拥护。巩固了新政权的基础。

丁：合作事业政策

1. 发展合作事业：合作事业乃是吸收大批群众参加生产建设事业的道路，经过了合作社不但可以在经济上组织起群众来参加了生产运动，而且可以从有计划的生产消费中，发展了工业，奠定了经济建设的初步基础，以与敌人作有效的经济斗争。发展合作事业的途径，是由运销合作进至生产合作，再进至信用合作。

2. 从经济上组织群众：从经济上组织群众，使群众均参加到自己所组织的经济事业中，这将是吸收千百万群众参加生产以便过渡到更高形式的经济制度的正确途径。

3. 改善人民生活：合作事业可以利用人民集体力量增加生产，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因此，也将鼓励人民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事业，为巩固新政权、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奋斗。

4. 积极投资扶植合作事业：为了使合作事业加速发展，政府准备在西北农民银行内，单独成立一部分，专门注意在经济上帮助合作社的工作，并且利用群众组织的力量，促进合作事业长远的发展。

（《晋西北行政导报》二、三期合刊，1940 年 5 月）

第二节 基本情况及机构人事变动

一、基本情况

银行组织在行署级设总行，专署级设分行，县级设办事处，各重要城镇设兑换所，惟银行在专署以下，均与贸易部门合一。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9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筹备就绪的西北农民银行，于本月10日上午10时在设行所在地举行开幕典礼，到会的有第十八集团军南汉宸参谋，第一二〇师贺师长、关政委、甘主任，第一一五师林枫、张稼夫二同志，新军总指挥部罗贵波政委，二纵队张文昂政委、韩钧纵队长，四纵队李力果主任，行署续范亭主任、牛荫冠副主任，塔斯社记者莫德文先生，新中华报记者郁文先生，兴县绅士牛友兰先生，牺盟会、工、农、青救联合会代表及本报记者共60余人。首由该行经理刘少白先生报告成立意义，继由各首长各代表发言，综其要点：第一，为了打碎敌人的经济侵略；第二，为了防止晋币通货膨胀，以解救民困；第三，为了巩固与建设新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郑重声明：银行所发行新币，一定以基金所有数为限。

（《西北农民报》1940年5月13日）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兴县士绅牛友兰在兴县城关经营的福庆永商号，捐出银洋三万元，作为西北农民银行的资本。

（黄伊基：“晋绥贸易总局和西北农民银行回忆片断”1986年10月）

编者注：黄伊基曾任西北农民银行会计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1995年病故。

（临县区讯）：行署为巩固金融，增进贸易，便利商人等之交易，决定在各专区各县成立西北农民银行或兑换所一事，业已筹备有日。兹悉第四行政区分行及碛口分行，已于5月12日正式成立。此外又在白文、克虎寨、离东、临南、方山等地设兑换所五处，现已开始业务。兹将该分行及各兑换所临时办事简则录后：

一、凡商人等持有本行发行之票币者，均可到本行（所）调换整元或各种角币。

二、凡持有本行破票三分之二以上者，均可换取等价之新票。

三、政府已严禁现洋法币在市面上流通。严禁任何商民人等持有或保存伪币，本行（所）鉴于农币数额之缺乏，兹为解决各界此种困难，对银洋、法币、伪币，作如下之规定：

1. 持银洋一元到本行可兑换本币一元，本行为嘉奖起见，并给以本币四元以下之奖金。

2. 凡持有法币无法周使者，可到本行兑换等量之本币。

3. 政府规定凡持有伪币者，一律在5月15日以前缴给当地分行或兑换所，本行为奉行政法令，从即日起开始收纳伪币，并规定伪币一元可兑换本币五角，此项收纳在5月15号以后即行停止。

四、汇兑事项在未奉到总行命令以前暂不办理。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抗战日报》1941年8月23日）